

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*

(代引言)

南京大学 程章灿

一、书籍史是中国学者“自家的园地”

“书籍史”亦可以简称“书史”，二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意味上却有很大的区别。在现代大学的文献学和图书情报学领域中，早就有关于书史的教学和研究成果。可以说，在“书籍史”舶来以前，“书史”一名行之已久，至少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。

谈到“书史”一名的出现，很多人都会提到陈彬龢、查猛济二人合撰的《中国书史》。此书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列入该社著名的《万有文库》丛书之中，这是我国第一部以“书史”命名的著作。尽管根据文献学者的考证，这部书实际上是抄录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和袁同礼相关论文拼凑成编的^①，但它确实得风气之先，表明“书史”一名在1930年代的中国已经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可，同时也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，表明“书史”这一新的概念与传统的版本目录藏书之学以及近代图书馆学的关系。因为被抄袭的作者之一叶德辉，精于版本目录之学，又喜藏书、编书、刻书，可以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书史专家，按照《中国书史》一书的逻辑，《书林清话》以及《书林余话》就是叶德辉撰写的书史。而被抄袭的另一位作者袁同礼，则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。

“书史”一名的成立，与现代图书馆学的成立也有关系。1922年，刘国钧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留学，加修图书馆学课程，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，他受聘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教授，从1928年秋起，他就在金陵大学文学院、北京大学图书馆系讲授图书目录之学。后来写出《校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”（10&ZD130）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 详参江曦：《陈彬龢、查猛济〈中国书史〉考辨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2018年第6期，第96页。

《中国书史简编》的先师程千帆先生,就是1930年代初他在金陵大学教出的学生。1958年,刘国钧根据自己历年授课的讲义,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《中国书史简编》。很长一段时间,这本书被用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材。1983年,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郑如斯订补本。此书论及图书的社会意义,提出书籍同时具有工艺产品和文化现象这两种属性,彰显了书史研究的两种新视角,但总体来看,本书的主要特点仍是以时代为序,讲述中国图书发展的过程。

事实上,在《中国书史简编》之前,刘国钧于1952年、1955年先后出版过两种书史研究的著作《可爱的中国书》《中国书的故事》^①。《中国书史简编》就是在这两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。此三书是刘国钧数十年书史研究心得积累的结晶。可以说,刘国钧既是金陵大学的中国书史研究传统的开创者,也是中国现代书史研究的奠基者。中国书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关系,也由此可见一斑。新时期以来,书史更成为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^②。

金陵大学的书史研究传统,有两个重要的分支。一个是海外的分支。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、曾选刘国钧中国书史课程的钱存训,后来出国留学,并以研究书史的学位论文 *The Pre-printing Records of China: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Books*, 于195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。这篇论文经过多年补充和修改,于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,书名改为 *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: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*,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周宁森博士译成中文本《中国古代书史》。其后,此书在中国大陆也出版了多种简体版,影响更大。总体来看,钱存训的研究更加重视书籍的生产过程,尤其是物质与技术方面,包括造纸术、印刷术等因素,可以看出他立足于传统书史研究,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学术的影响^③。

金陵大学书史研究传统的另一个分支,是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。程千帆先生1930年代初受教于刘国钧,1942年秋曾接替刘先生在金陵讲授校

①刘国钧:《可爱的中国书》,建业书局,1952年;刘国钧:《中国书的故事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,1955年。此二书内容皆不及《中国书史简编》丰富。

②198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郑如斯、肖东发编《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》,就是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学用书。

③参看别立谦:《钱存训对中国书史研究的贡献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6年第1期,第118-127页。吴格编:《坐拥书城 勤耕不辍:钱存训先生的志业与著述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3年。

讎之学。早在1941年,程先生就明确提出“治书之学,旧号校讎”,而新的校讎学应该包括版本之学、校勘之学、目录之学、典藏之学^①。他晚年与弟子徐有富合作完成的《校讎广义》,就包括版本编、校勘编、目录编、典藏编四个部分,建构了广义的校讎学体系^②。这四个部分同样也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核心。因此,所谓广义的校讎学,既是广义的“治书之学”,也可以说是广义的书史研究,还可以说是核心的古典文献学。

李致忠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,后来长期在国家图书馆工作,是著名的版本学家和文献学家。1985年,他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《中国古代书籍史》,此后又有《中国古代书籍史话》《〈文苑英华〉史话》《中国古籍十二讲》等多种书史著作面世^③。他的书籍研究,仍多采取版本学、文献学的写法,这也与他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经历相关。李致忠著作也使用了“书籍史”之名,但与西方书籍史显著不同。

新世纪以来,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相关成果,被陆续引介到中国来。国外学者以西方书籍史的视角研究中国书籍史的成果,也有不少被译介到国内,引起学界的注意,产生了较大的影响,也被国内同行所借鉴。系统而集中引进西方书籍史研究成果的,首推商务印书馆自201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“书史译丛”。这套专题译丛包括《书史导论》《莎士比亚与书》《书籍的秩序: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》《工具书的诞生: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》《图书馆的故事》《版权的起源》等^④,从各自不同视角展现了西方的书籍史研究。此外,其他出版社对西方书籍史也有一些介绍,但规模性和系统性不及商务印书馆。

①程千帆:《〈校讎广义〉叙录》《校讎广义版本编》,《程千帆全集》第一卷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1、6页。

②《校讎广义》有多种版本,最新的版本是程千帆、徐有富:《校讎广义》(修订本),中华书局,2020年。仍分为四编。

③李致忠:《中国古代书籍史话》,商务印书馆,1996年;李致忠:《〈文苑英华〉史话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4年;李致忠、芦婷婷:《中国古籍十二讲》,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,2018年。

④[英]戴维·芬克尔斯坦、阿利斯泰尔·麦克利里著,何朝晖译:《书史导论》,商务印书馆,2012年;[美]戴维·斯科特·卡斯顿著,郝田虎译:《莎士比亚与书》,商务印书馆,2012年;[法]罗杰·夏蒂埃著,吴泓缈、张璐译:《书籍的秩序——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》,商务印书馆,2013年;[美]安·布莱尔著,徐波译:《工具书的诞生: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》,商务印书馆,2014年;[英]马修·巴特尔斯著,赵雪倩译:《图书馆的故事》,商务印书馆,2013年;[美]马克·罗斯著,杨明译:《版权的起源》,商务印书馆,2018年。

严格说来,西方书籍史研究实际上包括两大类别:一类主要是以西方书籍史为研究对象,另一类主要以中国书籍史为研究对象。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与中国学者有同有异,无论同异,对于中国学者,都有他山之石的功用。总体而言,西方书籍史研究有如下四大特点:第一,强调书籍文化史研究视角,也就是强调书籍作为形塑社会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,如美国罗伯特·达恩顿(Robert Darnton)的《启蒙运动的生意——〈百科全书〉出版史(1775—1800)》^①。第二,强调书籍史中的各种动态过程,不是将书籍看作静态之物,而是将书籍看作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、活跃的、有生命的主体。这一动态过程包括书籍的生产、印刷、销售、流通等,各家具体的关注点不同,也就导致了方法与视角的差异。有关关注印刷技术及其与书之关系者,如《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——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》《印刷书的诞生》以及《谷腾堡在上海: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(1876—1937)》等^②;有关关注书籍与士人文化之互动者,如《书籍的社会史: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》^③以及前文提到的《书史导论》。第三,重视书籍的阅读过程、方法及其意义,戴联斌在《从书籍史到阅读史: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》中,对书籍史与阅读史研究的关系有详细的阐发^④,实际上,阅读史早已是书籍史的一部分。何谷理《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》和何予明《家园与天下——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》二书就是十分成功的案例^⑤。第四,重视书籍商品性,重视商业出版及其背后的通俗文化。例如包筠雅的《文化贸易: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

①[美]罗伯特·达恩顿(Robert Darnton)著,叶桐、顾杭译:《启蒙运动的生意——〈百科全书〉出版史(1775—1800)》,三联书店,2005年。

②[美]伊丽莎白·爱森斯坦(Elizabeth L. Eisenstein)著,何道宽译:《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——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年;[法]费夫贺(Lucien Febvre)、马尔坦(Henri-Jean Martin)著,李鸿志译:《印刷书的诞生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6年;[美]芮哲非(Christopher A. Reed)撰,张志强等译:《谷腾堡在上海: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(1876—1937)》,商务印书馆,2014年。

③[美]周绍明著,何朝晖译:《书籍的社会史: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9年。

④戴联斌:《从书籍史到阅读史: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》,新星出版社,2017年。

⑤[美]何谷理(Robert E. Hegel)撰,刘诗秋译:《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9年;何予明:《家园与天下——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》,中华书局,2019年。

易》和贾晋珠的《谋利而印：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》^①，观其书名，二书之宗旨一目了然。西方书籍史研究中所展现的宏通的眼光，见微知著的视角，以及注重将书置于中心并确认其主体地位的自觉意识，都值得我们借鉴参考。

总之，从学术史和学术传统来看，书籍史研究是一片广阔的园地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，这也是一片自家的园地。不管是文献学、图书馆学、出版学以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，都可以也值得在此领域投入精力、洒下汗水，也必将有可观之收获。这正是本期“书籍史专刊”意义之所在。

二、书籍史研究的新进展

一部书籍往往拥有多种身份，不同的身份，意味着其在书籍史网络中处于不同的网格点上。从书籍史的角度来说，这就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角度。例如，《思溪藏》既是一部宋刻书，又是一部佛教典籍。这意味着，它既是宋刻的代表，在宋代书籍生产尤其是版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；又是佛教典籍史的重要代表。另一方面，这部典籍在中国失传已久，清末才由杨守敬购得而回流中土。从这一角度来看，它又属于域外汉籍，走过将近千年的漫长的“书籍之路”，可谓身世曲折。从宋版书籍、佛教典籍和海外汉籍三个角度，都可以展开书籍史的研究。王传龙《〈思溪藏〉刊刻事项汇考》虽然涉及了三个视角，但主要集中在前两个视角，尤其是第一个视角。

王传龙所谓“刊刻事项”，主要是指刊刻时间、刊刻地点、主持者等等。刊刻时间包括刊刻的起迄时间，确定起迄这两个时间点，就为理解整个刊刻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时间座标。王传龙文所引日本京都南禅寺所藏《长阿含经》卷二十二卷首刊记，无疑是研判《思溪藏》刊刻时间的重要材料。这篇署“绍兴二年四月日谨题”的刊记称，捐资者王永从等人“谨发诚心，捐舍家财，开镂《大藏经版》总五百五十函，永远印造流通”。这段文字包含开镂、经版、函、印造、流通等有关书籍生产的专门术语，其中的“开镂”一词尤其值得注意。“开”“镂”二字实为同义并列，皆为雕刻之义。在北宋石刻中，镌字人常自称“开”“开石”“开字人”。例如，《挥麈录》三录卷二记九江琢玉坊碑工李仲宁，“刻字甚工”，自称“小人家旧贫窶，止因开苏内翰、黄学士词翰，遂至饱

①[美]包筠雅(Cynthia J. Brokaw)撰，刘永华、饶佳荣等译：《文化贸易：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；[美]贾晋珠(Lucille Chia)撰，邱葵、邹秀英、柳颖、刘倩译：《谋利而印：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9年。

暖”^①，此处“开”即是雕镌之意。嘉祐二年（1057）龙川白云岩陈偁题名后，署刻“僧应玘开石”，“开石”亦即“刻石”^②。明道二年（1033）刻《洛阳义从师幢》的洛阳刻工翟灵芝、熙宁三年（1070）刻《宁阳父母恩重经》的刻工梁玉，皆自称“开字人”^③。可见，在宋代，雕刻之义的“开”字是相当常见的。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，“开雕”一词仍然屡见不鲜，例如《周易集传》提要谓“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有是书跋，谓通志堂刻《经解》时以其残缺，故未开雕云云”^④，《新五代史记》提要谓“（欧阳）修歿之后，始诏取其书，付国子监开雕，遂至今列为正史”^⑤，《双溪集》提要谓“此本乃明万历丙申尚宝司丞王磷得沈一贯家旧本，为校正开雕者也”^⑥，不胜枚举。凡此诸例，其意皆为雕刻，而非“开始雕刻”。王传龙文根据《思溪藏》的卷函数量以及刻版的工作效率作出判断，论定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将“开镂《大藏经板》总五百五十函”理解为开工时间，是对“开镂”的一种歧义误读，这无疑是正确的。但是，《思溪藏》刊记中出现的“开镂”一词，却提示我们，至迟从宋代开始，“开”字作为一个专有术语，就已经为石刻生产和书籍生产所共用。石刻和书籍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献，彼此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有关《思溪藏》“刊刻事项”的研究，虽然只是一个个案，却增加了我们对宋代书籍生产史的认知，为后续的书史研究夯实了文献基础，也为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思路。

在追踪《思溪藏》“刊刻事项”的过程中，王传龙已经触及宋代刻书业的经济来源以及刻工问题，可惜限于主题，只能浅尝辄止。相关问题在丁红旗《再论南宋刻书业的利润与刻工生活》中得到更具体细致的讨论。丁红旗的研究展现了书籍经济史的视角，特色鲜明。在宋代书籍经济史方面，周生春、孔祥来《宋元图书的刻印、销售价与市场》、章宏伟《南宋书籍印造成本及其利润》已着先鞭。丁红旗从书籍刻工入手，角度是比较别致的。至少自南

①王明清：《挥麈录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187页。

②此条《石刻考工录》未注“开石”之题署，又误“偁”为“称”。曾毅公辑：《石刻考工录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45页。参看陆耀遹：《金石续编》卷十五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一辑第5册，新文丰出版社，1977年，第3329页。

③曾毅公辑：《石刻考工录》，第40、48页。参看程章灿：《石刻刻工研究》上编第三章《石刻刻工之题署及其身份之判定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55-56页；又下编，第231页。

④永瑤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25页。

⑤永瑤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六，第411页。

⑥永瑤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〇，第1376页。

宋起,刻书工匠与刻碑工匠往往二任集于一身。王诗安就是“梓人而兼石工”的较早的例子:作为刻书工人,他刻有薛师石《瓜庐诗》行世;作为石工,他刻有《薛叔似墓志》^①。元延祐四年(1317)刻《重修武安灵溪堰记》的万安泰,自署“黄州路绣梓”,曾毅公认为他就是“刻书工人而兼为石工者”^②。明代安徽歙县仇村黄氏亦兼营刻书与刻石。程敏政《篁墩文集》卷三十六《书赵松雪千文帖后》云:“吾乡侵梓刻石,必归之歙仇村黄氏。黄氏之彦曰文敬,尤以此得名。予刻先茔碑及侵《贻范集》,皆文敬率其子弟为之。”^③著名的清代吴趋穆大展局,在南京亦设有分号,刻碑并兼刻书^④。目前为止,关于宋代刻书价格的史料虽然很少,但仍有七种可用,而关于宋代刻石的价格史料,则几无所见。既然梓人石工常一身二任,那么,丁红旗文中关于南宋刻字工价、纸张价格的研究,对于同时代刻石价格的研究,显然也有有益的参照意义。除了宋代的刻书工匠,其他时代的刻工也有必要加以关注,不仅要关注他们的姓名及里籍背景,关注他们的板刻技术及传承,还要关注他们的社会生活及经济地位。

辨伪是古典文献学中的一门专门之学,《伪书通考》《续伪书通考》等书的流行,说明传统文献学界对于辨伪的重视^⑤。从书籍史的视角观察伪书,观察伪书产生的背景,分析作伪者的动机及其伪书的材料来源,进而探究其背后的学术文化史价值,是很有意义的。众所周知,丰坊是明代伪书造作的代表人物,“其平生好作伪书,妄谬万端,至今为世诟厉”^⑥,但是,另一方面,丰坊也为从书籍史的角度研究明代伪书生产提供了典型的案例。王赫《伪书的诞生: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》指出,丰坊“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”,“从疑经、改经到丰坊的伪经,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‘改写’传统,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”。这是从伪书造作的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,更多着眼的是人的因素;如果换一个角度,从书籍再生产的角度观察,也就是从书的角度,特别是从书的形式、构成的角度进行观察,或有新的发现。

明代是书籍史的重要阶段。传统对明代书籍史的认识,主要是继承自

①曾毅公辑:《石刻考工录》,第74页。按:原书“瓜庐”误作“瓜卢”。

②曾毅公辑:《石刻考工录》,第114页。

③程敏政:《篁墩文集》卷三十六《书赵松雪千文帖后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④参看程章灿:《石刻刻工研究》,第60页。

⑤张心澂:《伪书通考》,商务印书馆,1954年;郑良树:《续伪书通考》,台湾学生书局,1984年。

⑥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一三,第964页。

清人,还是比较粗线条的。清人多认为“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”^①,对明人的图书再生产付之以鄙夷。这种态度很容易忽略明代书籍史的生动具体的细节,俞士玲在《明代图书生产与思想争鸣:以李贽的图书刊刻为中心》中,就为我们展示了一系列这样的书史细节。明人文集中存留的大量有关书信、序跋,为我们观察明代书籍史提供了丰富的细节。刻书的过程,不仅是友朋之间社交往来的过程,更是学人之间思想互动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书商、中介、赞助者的作用,展示得更为清楚。明代学术思想生产、传播交流的方式也随之改变,李贽对于书籍刊刻的时间(万历二十八年是乡试年)、地点(南京是江南贡院所在地)的选择,透露了他对书籍传播的刻意。论文第五节提到的“遗书”,与王赫文中的“伪书”,作为书籍的两种特殊形态,都可以作为书籍史研究的课题。

编刊尺牍选本成为一时风气,初兴于明代末年,再兴于康熙初年。这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书籍史现象。首先,这涉及书籍形式的转换问题,原来属于写本的单篇尺牍汇聚选编,通过版刻而转换为刻本书籍。其次,这一转换过程不仅涉及尺牍的篇章别裁,而且涉及撰写者、编选者与评点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交际和文化互动圈子。第三,在商业出版的大背景之下,书籍销售的商业利益与尺牍作品的文艺审美价值之间形成了张力,这种张力对于编选、营销、阅读诸事项的影响,也相当引人注目。围绕着书业同行竞争和同类出版物竞争,出现了不同的编刊策略,出现了盗版与正版之争,出现了南京、扬州、杭州三个出版中心之间的竞争与合作,演出了明清书籍史上一场可以名为“三城记”的历史戏剧。因此,编刊尺牍选本既是书籍史研究的焦点,也是出版史研究的绝好案例。

蔡燕梅和刘仁的两篇论文互涉性相当强。蔡燕梅论文题为《从〈尺牍新语〉编纂看明末清初尺牍选本的商业出版》,而刘仁论文题为《从匡赞风雅到鼓吹休隆:丛书与明清文化转型》。前者着眼于商业出版以及编刊策略,着眼于书的本体;后者则以《檀几丛书》和《昭代丛书》为例,着重探讨丛书编纂背后所隐藏的文化、政治和学术权力作用。前者聚焦尺牍编刊,而后者侧重丛书的编纂,表面上看,二者视角不同,论述重点也不同,但实质上,两篇论文所聚焦的时段相近,而且尺牍刊本对二文主旨的展开都至关重要。刘仁的论述能够展开,得力于丛书编辑者张潮所汇刊的、包含其与友朋之间的1500余封信札的《尺牍偶存》《友声》。这两本尺牍汇刊犹如化石,凝固了以张潮为中心,横跨扬州、徽州、杭州等地,包括商人、文士、刻书家、编选家等

^①如陆心源《六经雅言图辨跋》称:“明人书帕本,大抵如是,所谓‘刻书而书亡’者也。”

(陆心源撰,冯惠民整理:《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》卷一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29页)

的人际网络,这为刘仁剖析提供了切入口。

张潮(1650-约1709)一生大致与康熙(1662-1722)时代相始终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),寓居扬州的徽州人张潮与杭州人王昶联手编刊《檀几丛书》,并于次年完成了初集的刊刻,二集刊刻直到康熙三十六年(1697)才完成。这是一套至今仍颇具时尚感的丛书。新旧世纪之交,上海文艺出版社曾约请饶宗颐、金克木、季羨林、程千帆等23位海内外华人学者,将他们研究成果中的精粹萃编成册,出版了一套“学苑英华”丛书,其颇具创意的萃编方式与张潮的《檀几丛书》异曲同工^①。刘仁有个新奇的发现:“在《檀几丛书》初集与二集之间的康熙三十五年,张潮却进行了《昭代丛书》甲集的编纂与刊刻。”他从康熙三十六年春张潮致王士禛书中,找到了张潮突然改弦更张的原因:“拙选《檀几丛书》初集,原与武林王丹老共事,后闻侍卫中有欲进呈者,因以己意更选《昭代丛书》一部,发凡起例,与前本略有异同。”对张潮来说,这确是他书籍编刊史上的重要转向,从“怡悦性情”的小品文字《檀几丛书》,一变而为“鼓吹休隆”的“辉煌典籍”《昭代丛书》,两者的性质与意味迥然不同,而编者张潮的身份意识也焕然一新。书中所谓“侍卫中有欲进呈者”一事至今无法考实,限于传闻而已。仅仅是一条莫须有的传闻,就轻易改变了张潮的书籍编纂计划,这既证实了刘仁的结论:“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,而且是其构建力量”,也证明了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上确实存在王汎森所谓“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”^②。饶有趣味的是,康熙三十七年冬孔尚任寄来《出山异数记》,以个人视角记述其面圣的经历,张潮建议将其改名为《幸鲁承恩私记》,强调“承恩”的一面,这是张潮自觉贯彻《昭代丛书》“鼓吹休隆”编辑策略的突出表现。鉴于上述事实,也许有必要进一步追问: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五年之间,无论是中央的政策层面,还是地方的文化层面,究竟还发生了什么政治事件,以致于影响了张潮的抉择?

在古代中国书籍史上,历代皆有官修之书,这些代表帝王旨意和王朝意志的“官书”,也可以称为“帝王之书”。围绕这些“官书”或“帝王之书”,展开了一部特殊的书籍史。宋初的四大书,明初的《永乐大典》,乾隆时编撰的《四库全书》,清代武英殿所刻的“清六通”,等等,都是官书。官书局,以及与编刻官书相关的其他机构设置、制度运营,都与“官书”书籍史密切相关。武英殿所刻“清六通”,究竟刊于何时,谁参与,谁主持,具体过程如何,在韩李良《武英殿本“清六通”刊竣时间新考》中有详细的讨论。这是武英殿刻书史

^①“学苑英华”丛书于1996年至2002年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共计23种。

^②王汎森:《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:清代的思想、学术与心态》(修订版)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5年。

的一个片断,也是清代朝廷刻书的案例之一。

传统文献学对于藏书与藏书家的关注,往往聚集在书的聚散以及书与人之间的因缘,在某种程度上,这种视角与书籍史殊途同归。藏书家都是爱书之人,但各自的爱书方式又有不同,有的珍藏秘不示人,有的想方设法化身千百分享同好。近代著名藏书家徐乃昌影刻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《玉台新咏》,意在与同道分享。这部影刻“写刻精良,版风雅致,是近现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作”,由于过于逼真,以致徐乃昌板片流出之后,有人故意挖去翻刻痕迹之后刷印,并成功地冒充明本,欺世牟利。南江涛《徐乃昌影刻〈玉台新咏〉考》不仅详细考索了徐乃昌影刻《玉台新咏》的过程,而且探讨其动机与目的,指出徐氏影刻此书的用途,主要是作为“礼品书”。读完这篇论文,我对书籍的物质性有了更多层面的认识。在抄本时代,每个抄本之间肯定有不同,这是容易理解的。在刻本时代,同一底版的不同刻本之间,由于用纸、用墨、压印用力、装订用线等物质因素的影响,也会产生各本之间的个体差异。此其一。即使同一版次并且纸墨印装完全相同的印本,在流传过程中,也可能因为流传过程不同,而有了不同的序跋题识,并拥有各自的物质特征。此其二。同一版本书籍的这种物质性差异细节,如果不是目验手核,如果未受版本学或藏书学的相关实务训练,是不容易发现的。最近,有版本学研究者提出了“实物版本学”^①的概念,我认为,这一概念有必要引入书籍史研究领域,建立一门“实物书籍史”和“书籍物质史”的分支。“实物书籍史”侧重的是切入对象的研究视角,与藏书楼及图书馆等联系较为密切,而“书籍物质史”着重的是对象的物质属性,与出版者、刻印者的关系更为密切。

作为一部官修大类书,《永乐大典》的编纂、抄录、转运、传承以致流散亡佚,伴随着明朝迁都、明清易代、清末战乱以及民国以来的内乱外忧,经历了一个书运与国运相互联结纠缠的曲折的历史过程。从这个角度可以说,郑云艳《民国以来〈永乐大典〉海内外流通价格变迁考》不止是20世纪书籍价格史和经济史的研究,更是20世纪书籍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种别致的展开。

三、书籍史研究之前瞻

王传龙文中所谓“刊刻事项”,亦可简称为“刊事”。刘仁在其研究书籍史的博士学位论文中,提出“书事”的概念。所谓“书事”,包括书籍的编选、

^①参看李开升:《明嘉靖刻本研究》绪论二之(二)“实物版本与实物版本学”,中西书局,2019年。

评阅以及借助书籍而开展的知识分享与礼物馈赠^①。按我个人的理解,所谓“刊事”正是范围更广的“书事”的一部分。何予明在其《家园与天下——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》中,标举“书文化”的视角。“书文化”一词涵盖最广,可以将“刊事”“书事”包括在内。文化史的视角,无疑是书籍史研究中最为核心的视角之一。

中国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,可以结合传统文献学、中国书史和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思路,建构中国的书籍史研究体系。首先,书籍史的研究,可以从各种专题史的角度展开。将书籍研究与各种史学、文化学相结合,开展书籍社会史、书籍经济史、书籍史料学、书籍阅读史、书籍艺术史、比较书籍史的研究^②。所谓比较书籍史,既可以是中外书籍史的比较研究,也可以是各种汉籍之间的比较研究。域内汉籍与域外汉籍之间,东亚汉籍的和刻本、朝鲜本和越南本之间的比较研究,也是比较书籍史的内容。

其次,书籍史的研究,可以从断代史、分类史、区域史等角度展开。断代的书籍史,关注宋代以降者居多,这自然是因为宋元明清书史资料较多之故。除了目录学的分类,书籍还有其他分类,例如从刊刻角度区分,有官刻、坊刻、家刻等类别;从用途角度区分,则有考试用书(制义刻本)、蒙学读物、礼品书、历书、日用类书、畅销书等类别。以区域划分的藏书史、刻书史,已有不少成果。贾晋珠《谋利而印》就是区域刻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,因此被列入“福建印刷文化研究丛书”,这套丛书令人期待。需要说明的是,上一段所言各种专题史以及此段所言各种“区块史”,固然是整个书籍史研究框架中的“区块”,而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视角,可据以展开各种深入具体的研究。实际上,在具体研究中,不同的角度往往融合为用,例如何朝晖《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》,就是断代史与专题史视角的结合^③。

第三,书籍史的研究,应该注意从周边看中心。这里所谓“周边”,指的是往常不太为人看重的边缘人物和边缘史料。所谓边缘人物,包括代笔、代刻、代校、代书、赞助等各种人物,也包括书籍生产进程各阶段的各类“隐身人”“捉刀人”,如没有大声宣扬的赞助人、默默无闻的校阅者、少见经传的销售者、秘不作声的合作者等。所谓边缘史料,是指以往不太受到重视的书的各种副文本,以及零星散在各处而有待发掘的序跋、日记、书信、档案等史

①参看刘仁:《张潮及其友朋书事考论》,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(赵益教授指导),2020年。

②关于书籍艺术史,近年有陈亚建:《中国书籍艺术史》,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2018年;更早的则有邱陵编著:《书籍装帧艺术史》,重庆出版社,1990年。

③何朝晖:《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9年。

料。书籍史应该重视各种与书相关的史料,明清时代的各种写本文献尤其重要。

第四,书籍史的研究,应该重视书与人的个案研究。书的个案研究,多集中在经典、名著、大书,也可以集中于某些有个性的小书。人的个案研究,主要集中在名家的阅读,书籍阅读对名家成长的影响,是“进”与“出”的关系,特别值得关注。宋代以后的书史,能够提供名家在阅读中成长的足够史料。此外,对于书籍的各种形式的消费与利用,也有必要展开个案研究。

第五,书籍史的研究,应该有超越书籍史的胸襟和视野。研究中国书籍史和古典文献学的学者,对于简帛石刻等究竟是否属于书籍,有不同的看法,但是简帛石刻以及其他各种写本文献等等都属于文献,大家是没有异议的。超越书籍史,就是打破书籍与简帛、石刻以及各种写本文献的界限,将其作为文献的一种,不仅立足于书文化史的角度,更立足于文献文化史的高度,获得更高远的视野^①。换句话说,书籍史可以作为文献文化史的一部分,从书籍史角度,对传统文献学史中的各种史料作新的梳理,对各种论述作新的阐释,尝试理论提升,那么,中国传统的“治书之学”必将与时俱进,“其命维新”。

^①参看赵益:《从文献史、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》,《南京大学学报(哲学·人文科学·社会科学)》2013年第3期,第110-121页。